

会员通讯

2017年第10期

(总第76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

2017年11月30日

目 录

工作动态

外资正在撤离中国吗？——第十四期国经论坛系列讲座 ... (2)

国经中心举办100期经济每月谈 (4)

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会见日本三井住友银行顾问星文雄 ... (5)

权威言论

曾培炎：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体党员大会上的讲话 (7)

张晓强：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13)

魏建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新时代 (22)

张大卫：共商共建共享：中国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理念 (24)

陈文玲：坚定推进创新驱动战略 (27)

张燕生：新时代要提高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 (28)

张永军：新时代呼唤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33)

成果目录 (35)

国际交流 (36)

[工作动态]

外资正在撤离中国吗？ ——第十四期国经论坛系列讲座

2017年10月17日下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联合举办第十四期“国经论坛”系列研讨会，主题为“外资正在撤离中国吗？”。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致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裴长洪、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卢进勇、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张建平分别做演讲并讨论交流，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陆晓明主持会议。



研讨会对当前阶段外商投资企业是否撤出中国进行了热烈讨论。专家们认为，外商投资企业也有一个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问题。2005年前，外商投资企业更多看中的是中国低成本投资环境；

2012年前，外商投资企业更多看中中国快速增长的市场环境；2012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更多看中的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新增长点。不适应新常态的外资正在离开中国，转向本土或东南亚、南亚；高科技制造和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仍在积极进入中国。过去外商投资70%是进入制造业，我国制造业外商独资企业占比11%、民营企业61%、国有企业28%。现在外商投资70%是进入服务业，尤其是知识、技术和人才密集型服务业。如何实现好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改善营商环境，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如金融业，国有经济的比重占到90%，应创造条件扩大开放。未来，我国需要进一步厘清利用外资的战略思路，力求实现“三个转变”，即：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和世界创新中心转变；从引资为主向引资、引技、引智、引制融合发展转变；从优惠政策为主向需求引导、供给合作、透明可期、全球运作的合作伙伴转变。政策举措方面打造“四个重点”，即：打造充满活力的需求环境、开放公平的市场准入环境、竞争力强的成本环境、规范安全的监管环境。专家们认为，如果这些改革举措到位，乘党的十九大东风，将会迎来高水平外商来华投资的新热潮。

演讲结束后，专家们与媒体和听众进行了热烈交流互动。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国经中心举办 100 期经济每月谈

2017 年 10 月 19 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第 100 期经济每月谈，会议主题为：“十九大报告解读：深度分析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会议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德水主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发表演讲。



陈文玲分析，2007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正在崛起，在国内外环境影响下，中国第四季度的 GDP 增速可能会达到 7%。2017 年、2018 年国际经济形势主流是向好。中国经济也将呈现出稳中求进，稳中求好，稳中求远的态势。她还指出，十九大描绘了中国两个阶段的路线图，我国从现在到 2035 年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 2049 年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文明、美丽的世界强国。未来，中国将在世界舞台承担更大的责任。

徐洪才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势头非常明显，外部需求回暖，第三季度中国 GDP 同比增速达 6.8%。2017 年前三季度物价稳定，就业形势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得到改善，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经济增长表现超过预期。2018 年将延续 2017 年稳中向好的趋势，但是经济增长速度会有一点回落，符合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未来，在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保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不变，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要改变，但是要加大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灵活性这些方面还需要继续发力。

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会见日本三井住友银行顾问星文雄

2017 年 10 月 24 日，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会见日本三井住友银行顾问星文雄先生一行，双方就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形势以及双边经贸合作情况等交换了意见。交流部部长许朝友、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林江博士陪同参加了会见。

张晓强首先向日方介绍了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情况。他认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保持 6.9% 的中高速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的显著成效，物价水平维持在 1.5% 左右，总体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但经济运行中尚面临着企业负债率偏高以及潜在的金融风险等突出问题，经济发展中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值得关注。



星文雄表示，由于安倍政府采取金融、财政等措施，日本经济出现了好转，但企业员工工资并未上涨，国内消费仍然不振，2%的通胀目标迟迟难以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社会老龄化问题严重，劳动力供给不足，因为人口不再增长，私人消费不高，企业无法加大投资，而且日本生产效率也不高，亟需调整海外劳动力引进政策。

张晓强向日方介绍了中心与日本经团联拟于今年12月初共同举办第三轮“中日企业家与前高官对话”的筹备情况，指出中日双方将就两国经济形势与宏观政策协调、贸易投资及金融合作、科技创新和医疗旅游合作、以及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多个议题开展深入探讨交流，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健康向前发展。

星文雄赞赏中心与日本经团联为促进中日交流合作做出的努力，表示中日为近邻，两国应继续加强经贸和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此外，双方还就时下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会议和日本国会选举等热点议题交换了看法，并表示将继续保持往来交流，推进双方合作。

[权威言论]

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体党员大会上的讲话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曾培炎

(2017年10月26日)

10月18-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承担着谋划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大会批准了习近平同志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批准了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并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会议选举产生204名中央委员、172名候补中央委员，133名中央纪委委员。中央委员中60%是新面孔，中央领导层顺利实现了新旧更替。

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和国家面貌焕然一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得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及全世界的称赞。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最重要、最关键的是，我们党有了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有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这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是从今年1月份开始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起草组组长。报告起草工作始终贯穿着民主精神、充分听取了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了6次座谈会，直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党的十九大报告稿，决定正式提交党的十九大审查。

3万多字的报告纵观历史、展望未来，浓缩了5年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成绩、经验与启示，描绘了从现在到2020年乃至本世纪中叶的宏伟蓝图。在3小时26分钟的报告时间里，全场共响起70多次热烈的掌声。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深刻回答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整个报告主题鲜明、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气势恢弘、催人奋进，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通篇展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创新成果，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报告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新”，一系列新判断、新思想、新方略、新目标让我们倍感振奋和鼓舞，社会各界包括国际社会反映也非常热烈。

新时代——

在全面总结党的十八以来的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取得的全方位

的、开创性的巨大成就和发生的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标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不是作为执政党的自我划分，而是源于我们已经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理论支撑和实践逻辑。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清晰地指出了“新时代”的科学内涵和时代昭示。特别是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标志着我们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36年后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高度作出全新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关注的光圈变大了，问题的对焦却更精准。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是对五年来中国发展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的深刻总结，是对近40年来改革发展成果的历史回应，更是对未来中国发展方向、发展目标的精确定位。

新使命——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十九大报告强调，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必须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个伟大”所诠释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使命，体现于新思想、贯穿在新征程、承载着新目标，成为十九大报告中的一条“精神脉络”。“四个伟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新思想——

思想是政党的灵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始终重视思想建设，始终重视思想创新与发展。党的十九大向世界宣告了从继承和实践中形成的新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又一个极具开创性的重大理论成果，成为照耀新时代、指引新征程的明亮灯塔。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焕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为解决当前世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报告全面阐述了这一思想的理论体系和科学内涵，提出了十四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内容丰富、博大精深，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各个领域，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新征程——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宏伟蓝图，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目标，是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之“新”，体现为战略目标实现的步骤更加明确，既明确任务又指明路径，科学缜密地进行战略谋划。新征程之“新”，还体现为战略目标内涵的丰富拓展，如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将第二个百年目标丰富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报告提出了新时代的重大发展战略和新的发展路径，围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作出了系列、全面的论述，为我们在新时代、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行动纲领，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

在具体部署中，报告还专门写道“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国经中心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以新思想为指导，围绕新目标、新征程，找准智库定位，理顺发展机制，创新管理模式，锐意进取，努力将中心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新型智库。

今后一个阶段，中心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和发改委的部署，精心制定学习方案，有计划、分步骤地抓好实施。全体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和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扎实做好中心各项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

（信息来源：在国经中心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体党员大会上的讲话 2017年10月26日）

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张晓强

(2017年10月30日)

中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2016年两国分别占全球GDP的15%和24%，合计39%；能源消费分别占全球的23%和17%，合计40%；科技研发投入分别占全球的21%和33%，合计达54%。两国也是世界货物贸易第一、二位国家，中美货物贸易额2015年达5580亿美元，是2005年的2.64倍。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销售额近5500亿美元；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当年在华销售汽车390万辆，平均每8秒钟卖出一辆，2017年1-9月在华销售汽车275万辆，比在美国本土销售量多25.3%。近几年，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快速增长，2015年150亿美元，2016年达450亿美元；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库券近几年达1.3万亿美元，居外国持有量首位。

以上数据，反映了中美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双边经贸关系的紧密联系。这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是在WTO规则及多双边协定架构下实现的，也是两国秉持开放政策促成的。深层原因则是优势互补，而且双方都从经贸合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对中国而言，美国是第一出口市场，占中国出口比重达16%，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稳定的外部需求；美国在华投资近7万家企业，给中国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创造了200多万就业机会和税收收入。2016年中国从美国进口近3400万吨大豆，若在中国种

植需要利用近 1500 万公顷耕地，相当于中国现有耕地面积的 12%。美国是全球金融业中心，全球规模最大的资本市场。截止 2017 年 2 月，有 130 家中国企业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70 多家在纽约证交所交易。2014 年中国阿里巴巴公司在美国上市创造了历史上 IPO 最大的记录。这些不仅仅是融资方面的作用，也有助于中国企业提高全球知名度，促进企业改革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对美国而言，中国是北美地区以外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过去 10 年，美国对华出口年均增速达到 11%，远高于美国同期出口平均增长 4% 的速度，也比同期中国对美出口年增 6.6% 高不少。今年 1-9 月，美国对华出口 11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8%；中国对美出口则增长 11.5%，为 3091 亿美元。美国出口 62% 的大豆、25% 的波音飞机，17% 的汽车销售给中国。2016 年中国进口美国电影 51 部，给美方带来收入近 160 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大量质优价廉的商品，不仅有助于美国保持较低的通胀率，也提高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据美中贸易关系委员会的研究，2015 年对华贸易平均为美国每个家庭年节省 850 美元。据中方统计，2006 年至 2016 年，美对华服务出口由 144 亿美元增长到 869 亿美元，顺差为 560 亿美元。2016 年中国在美国留学生的数量超过 35 万人，占在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 34%；按美国商务部测算，为美国贡献了约 160 亿美元的收入；中国赴美游客近 300 万，增长 15%，消费支出 330 亿美元，增长 9%，分别占去年赴美游客总量（7650 万，同比下降 2%）和支出（2447 亿美元，同比下降 1%）的 3.9% 和 13.4%。

中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结构、资源条件均有不同，各有比较

优势，这是形成经济互补关系、互利共赢的基础。比如，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已超过 25%，在 500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 220 多种产量居世界第一位，规模大、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中国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以电子制造业为例，中国的深圳等地区已形成世界上最具成本竞争力的、规模最大的电子产业供应链。美国苹果公司的手机、电脑产品在全球 700 多家供应商中，近一半在中国。中国的高速公路、铁路、港口、发电与电网等规模与水平均是发展中国家最好的。中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素质良好和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按照国际统计口径，中国劳动力人口约 9 亿，而欧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总和也只有近 7 亿。据测算，2016 年美国蓝领工人薪酬是中国工人薪酬的 8 倍之多。

美国则是科技实力全球领先、消费市场全球最大者。在电力、天然气、土地、物流、融资水平等方面具有竞争优势。美国在航空、电子信息、生物科技、高端装备制造、材料等领域位于世界前列。集成电路及相关制造设备、电气机械、化工设备、高档机床等产品水平高，受到中国用户的欢迎。《福布斯》发布的 2016 年全球最大 15 家科技公司中有 10 家总部位于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网站 10 月 24 日发布的全球最佳 1250 所大学中，美国居首位，达 221 所。这些是美国的比较优势所在。

正是由于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才使中美经贸关系可以克服困难、不断发展并实现了双赢。不可否认，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问题，有些是存在多年的，有些是近几年发生的。重点体现在贸易逆差、双向投资与市场开放、科技创新

与知识产权（IPR）等三方面，我也愿借此机会谈谈个人的看法。

第一，关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首先，服务贸易，中方是大逆差；货物贸易美方有较大逆差，但对双方规模的统计数仅 2016 年就相差 1120 亿美元，中方是 2540 亿美元，美方是 3660 亿美元。前几年，两国商务部就统计差异进行的联合研究表明，美方统计的 2008 年-2014 年逆差数据平均高估 19%。其次，在国际分工的格局下，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与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布局密切相关，是国际分工梯度较多的结果，现阶段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有很大部分是承接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对美贸易顺差的转移。据美方统计计算，2001 至 2016 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占美逆差总额的比重从 20% 升至 47%；但同期美国对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逆差比重则从 23% 降至 11%。还应该说明的是，中国全部出口的约 45% 是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外资企业；比如苹果公司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惠普公司、戴尔公司电脑的 80% 左右是在中国总装后销往美国及世界各国。关键零部件来自日、韩和中国台湾，关键技术及专利费主要是美国公司收取。据第三方机构调查，一台 iPhone7 手机最低售价 649 美元，组装在中国，成本为每部 238 美元，归于中国企业的仅有 6 美元加工成本和一家公司供应的电池 3 美元；其他 200 多美元，是多家外国公司供应的元器件、美国高通公司等收取的专利费。生产成本之外的部分，主要是运输、进口商、零售商各环节利润、成本及税收。而苹果公司所得最多，每部手机的利润达 200 美元。如果简单从中国对美出口金额看，肯定难客观反映情况。再次，是美

国政府实行的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影响了美国企业优势的发挥。2001年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曾占中国进口同类产品的16.7%，2016年降为8%，这与美国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的地位明显不相称。从集成电路产品与制造设备、高档数控机床、先进材料、先进生物科技产品，到民用航空航天设备与技术，有多种多样的复杂的控制体系。中方为此多年向美方提出意见。2010年美国宣布启动出口管制体制改革，但几年过去了，主要是放宽了对盟国等的出口限制，但对中国无实质举措。2016年，中国进口集成电路2750亿美元，而进口的石油、天然气、大豆、铁矿砂合计仅2520亿美元。如美方放宽过度限制，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会大幅增加出口，从而大大降低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据今年4月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份报告，如果美国把对华科技产品转让的规定放宽到对巴西的水平，可以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减少24%；如果放宽到对法国的水平，则能减少34%。

第二，关于双向投资。

按存量计算，美国是按国别投资中国最多的，而中国近几年对美投资在快速增长。近期面临的问题是，美方认为中国的开放还不够，不对等；中方则认为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安全审查机制等构成了严重阻碍。

首先，按照中国加入WTO的承诺，所有协议规定的内容，中国均已兑现。例如，对外资银行的币种、地域和客户范围限制均已取消。这几年欧美各国谈的是希望中国更加开放，减少领域和股比等方面的限制，特别是在金融、文化等领域。对此，中国政府已明

确表示，要进一步扩大开放，逐步实行对外资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在上海等自贸实验区已开始这样做，今年八月颁布的新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已将“限制类”减少 30 项，降至 63 项。但最终肯定会有少量领域/行业列入“负面清单”，这是国际惯例，重点在于留多少类别？这是需要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等确定的。遵循的原则，美、欧讲“对等”（reciprocity），中方讲“平等”（equality），二者内涵是不同的。因为发展阶段、管理水平等差别很大。比如在金融领域，在中国审慎管理能力低、国际投机资本活跃的情况下，开放度不可能达到英国金融开放的水平；又如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不允许私营公司做基础电信、办电视台，而欧美是允许的；这需要协商解决，而不能简单讲“对等”。

对美国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中方认为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有歧视，透明度不够。美方则认为用的并不多，对中国国有企业应该更严格。从统计数据看，2012 年-2014 年，中国连续三年位居美国 CFIUS 审查国别数量第一，合计 68 个项目。但中国投资只占美国吸引外资的不到 10%。据不完全统计，因安全审查导致在美投资受阻的中国企业投资项目金额已超过 500 亿美元。即使有的投资最终能批准，也要求签署了严苛的“缓解协议”，对企业的具体经营、业务内容等确定严格的限制条件，包括中国投资人到实地访问需提前 15 天告知美国政府机构、甚至不允许到运营现场。太阳能发电是清洁能源项目，同一个区域，中国民营企业去投资并购就被否决，而加拿大公司就能获批准。在 CFIUS 框架下，笼统地表述为“并购美国重要基础设施、先进技术企业就要考虑安审”，但从不列出具

体行业。特朗普总统已多次讲要加大对美国现有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改造升级，中国企业在公路、高铁、机场等领域也有实力。但如果美国对“基础设施”哪些是重要的并对外资进行安全审查不透明，以 PPP 模式等吸引中国投资就难以实现。

第三，关于科技创新与 IPR 保护。

重视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中美两国共同的特点，美国仍然高居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正在快速发展。对自主创新，我认为中、美都是认同的，一国的科技能力增强当然主要靠自己，而不能靠外国。与此同时，两国也都注重引进优秀科技人才，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认为中国的大量技术是强迫美国公司转让的或是偷来的。班农先生在白宫任职期间说，“我们贡献给中国的是我们的技术，我们不得不把作为美国资本主义基本精髓的创新能力拱手让他们”。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美国大公司 CEO 不满于被迫向中国合资伙伴转让技术，要根据美国《贸易法》中的‘301 条款’对中国窃取 IPR 的问题展开调查。”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阐述了立场。我在此主要从个人工作经验及与美方商谈的实践谈一谈。

首先，中国从美国引入的技术是付费的，不是白拿来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花上亿美元从美国 GE 公司引进煤炭大型发电机组成套技术，九十年代从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引进程控电话机、移动电话技术。最近几年，中国企业为移动通信芯片、手机制造，每年向美国高通公司付大额技术费与专利使用费，已占该公司总收入的 57%。美国公司是世界上管理能力、经营水平最优秀的，我认识很多大公司负责人，没有遇见把自己的好技术低价卖给中国的。其次，关于

“强迫向中国合资伙伴转让技术”，在中国加入 WTO 之前确实如此。当时中国的“外资法”等就规定以转让先进技术为政府批准外商投资的条件之一。因这种规定违反 WTO 规则，在 2001 年底中国加入 WTO 后对大量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修订，有关政府部门要求对外商转让技术的内容已全部取消了。我曾几次向美国政府商务部、贸易代表署（USTR）、财政部、国务院高官问过，你们讲中国强迫美国公司转让先进技术，有证据请拿出来，是哪级政府、哪个机构在批准文件中有这样的条款？如果有，中央政府马上去查办。但我从未见美方提供过这样的文件证据。至于说是“被迫向中方合资伙伴转让技术”，那就要换个角度分析了。“合资”是商业行为，双方都想获取更多好处。中国企业在本地市场与人才、营销网络及产业供应链等方面有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公司在先进技术、经营管理和海外市场营销方面有优势，这是大格局。中国企业家希望在谈判时把自己的优势多做价，并要求外国公司把先进技术引入而且做价越低越好，以便提升中方的投资效益；外国企业家则采取相反的办法。这是常规的谈判、是商业交易，在竞争十分激烈的中国更是如此。不这样去谈判“合资”的，绝不是好的企业家。这种情况下最终能否谈成是企业家之间的事情。此外，我引用一组数据。2015 年和 2016 年两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合计 2520 亿美元，其中“外商独资”方式为 1820 亿美元，占比重 72%，即：外商独资是近年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最主要方式，这不存在“合资伙伴”，当然也不存在中方企业向“合资伙伴”低价甚至是白白索取技术。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也同样是以独资方式为最多，这是基本事实。

关于 IPR 保护，中国在三十年内走过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所走的路，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先进国家相比，在法律体系、执法力度等方面还有差距。但在倡导创新文化、强化 IPR 创造、保护、运用的原则上，是有共识的。这不只是对国际社会负责，更是为了有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中国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而且随着中国科技水平的提升、若干领域的技术与 IPR 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打击外国不法者窃取中国 IPR 行为正成为中国日益重要的工作，也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以上介绍，主要是我深感随着中美经济往来的规模扩大、水平提升，在合作中必然会出现一些矛盾，关键在于要本着科学求实的态度，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精神，研究提出有效合理的解决方案。以保护主义的方式，简单实施单方面制裁等举措，只能使双方都受损。当今世界，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加强经济结构改革政策、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加强金融监管与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国际贸易投资合作与发展，缓解基础设施瓶颈制约，减少发展及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方面，都需要国际社会及中美两国共同努力。对网络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反恐、防止大规模传染病传播等方面的全球性挑战，需要中美及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在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

益，支持多边贸易体系，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10月25日习主席应约与特朗普总统通电话，特朗普总统表示，我密切关注习主席在会上发出的重要政策信息，期待着同习主席在北京会面，充分交换看法。习主席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愿同美方在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期待着与总统先生共同规划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美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发展得好，不仅造福两国人民，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也有重大作用，中美智库、专家也应共同努力，做出更大贡献。

（信息来源：在中美全球经济秩序对话会上的发言，2017年10月30日）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新时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魏建国

（2017年10月26日）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判断为我国发展指出了新的历史方位，也对我国今后全面工作，包括外交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体现出与时俱进的鲜明特点。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指出，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

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应该看到，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此，在未来世界舞台上，中国会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

可以预见，今后，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创造人类美好未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信息来源：《光明日报》 2017年10月26日 13版）

共商共建共享：中国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理念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张大卫

（2017年10月26日）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从国际社会看，继2016年11月“一带一路”倡议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后，近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决议，“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首次被纳入联合国决议。这表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再获丰硕成果。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2015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此后，他在多个场合反复论述、深入阐发了这一理念的重要意义及实践价值。“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首次被纳入联合国决议，说明国际社会已对这一中国理念形成了高度共识，中国智库有责任更有义务进一步解读宣介、积极倡导、深入推进。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理念以中国的发展实践和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为依据，以国际上一切主张经济全球化的国家、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内心期盼为回应，清晰地勾勒了其时代特征、价值目标和实现路径。

第一，这一原则与理念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共商共建共享”基于中国对时代发展和国际经济大格局的判断，是在经济全球化面

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情况下提出的解决方案。在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记者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加快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针对造成当前经济全球化失衡的一系列弊端，推动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倡导各种经济体特别是体量已经很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机制和制度的创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主张以协调应对挑战，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分歧，共同促进世界的发展、安全与和平。

第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引领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福祉不断改善提升的进程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了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倡导新的全球经济治理观时的价值指向和目标体系。对人类前途与命运的思考，是马克思主义的永恒话题。当人类社会面对贫困、疾病、战争、自然灾害、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拉大等诸多矛盾和问题时，正走在强国道路上的中国，必须把自己的梦想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才能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成为促进全球繁荣发展的共同目标。习近平同志从历史的大逻辑出发提出这一构想，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中华文明“兼济天下”人文精神的高度体现。

第三，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是贯彻落实全球治理新理念的正确途径。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在战争与和平、繁荣与发展等重大课题上，在贸易、投资、金融、科技、信息、

创新、消费、全球供应链等很多全球治理领域，还有很长的学习过程。对此，要利用好各种渠道与平台，与各国共商全球发展大计，特别是解决好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与动能不足的问题，制定以共赢为目的的经济调控政策。在共建合作平台方面，中国始终秉持大国的责任担当，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的全球治理平台上，在与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国家、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国家的合作中，积极探讨有利于改进现行管理体系的规则标准，以建立起公平合理、面向未来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同时，中国还以互联互通为重点，与国际社会共建投融资平台，为贫困和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家提供帮助。在共享发展成果方面，中国欢迎有关国家抓住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机遇搭上顺风车；另一方面，通过建设“一带一路”、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丝路基金等，不断丰富全球和区域经济的合作内容。需要强调的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呼啸而来，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共享各国科技创新成果，共享各种业态、模式的创新和国际产能合作，惠及全球更多的国家和民众，应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重要选择。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为“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应该看到，我国当前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仍需提升，迫切需要政府部门和广大智库全面领会报告精神，凝聚磅礴力量，更好地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信息来源：《光明日报》 2017年10月26日 13版）

坚定推进创新驱动战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陈文玲

(2017年10月29日)

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这意味着，必须把创新摆在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这不仅是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选择，也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与保持中高速持续发展的“灵魂”。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创新提出的更高要求和创新的更高境界。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创新是打开思想之窗，放飞梦想的巨大力量，将催生更多原创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实践创新是激发亿万人民创造、创意和创业的号角，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实践创新一直走在理论创新前面，把实践创新凝练和概括为新理论、新战略、新政策已成为中国成功经验的一部分；制度创新是保障进一步释放创新动能的制度性安排，这既是我国持续保持创新活力的根本性改革，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现在真正的短板；文化创新更是激发创新灵感、

产生更大创新动力的渊源，是把几千年文化精华和文化内涵的积累转化为软资源、软竞争力的不竭源泉。

作为经济发展的“灵魂”，创新可以激发人作为生产力第一要素的灵感，激发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冲动，激发人力资本较之货币资本更大的创造力。未来，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创新驱动战略，最大限度吸收一切创新要素，早日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目标。

（信息来源：《经济日报》 2017年10月29日8版）

新时代要提高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燕生

（2017年10月26日）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事件，直面对当前全球治理环境的历史机遇和严峻挑战，提升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过去五年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取得的成就

五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

推动构建与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相一致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同志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对照现实可见，全球治理长期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不能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也未能及时反映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因此，消除治理赤字是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一大紧要任务。而如何

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如何解决“发展缺位”问题，都是全球治理应面对的难题。过去五年，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方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比如，G20既引入“和而不同”的中国智慧，又引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既引入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中国治理观，又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基于西方规则的国际秩序和规则体系；既反映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又公正合理地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真正构建基于和平、合作和发展规则的，尊重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同宗教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全球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着力解决经济全球化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损的不平衡发展问题。

倡议并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方面主动作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对于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各国内生发展动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包容普惠方向发展。在“一带一路”沿线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理念相同的共同体，致力于实现共商共建共享，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有助于构建优势互补、合作互动、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立和完善金砖机制，完善有效开放、基于规则、有利发展的多边国际经济秩序。习近平同志强调，“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要以此为指引，构建不断扩大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朋友圈，建立国际最广泛统一战线，和发达国家一道，共同

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

我国仍处于危中有机国际治理环境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对中国的发展而言，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另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这种形势下，要充分认识当前全球治理环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主动做好转危为机的工作。

逆全球化趋势可能带来一定时期的全球不确定性。当前全球性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和竞争加剧。在此形势下，“中国要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推动改善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作出应有贡献。

全球性新工业革命如何带动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长加速，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一轮产业革命如火如荼，同时，全球生产率却明显减速，不但增速低于历史均值，而且持续时间较长。从短期看，生产率减速拖累了全球GDP增速，更为重要的是，全球生产率减速可能将是一种长期趋势，降低全球经济中长期增长水平。劳动生产率变化，一方面与技术进步有关，可用全要素生产率TFP反映，另一方面也与劳动者素质、人均资本存量等有关，可用劳动生产率与TFP的差额反映。全球劳动生

产率减速主要由技术进步减速导致。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人均资本存量、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仍稳步增长，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有较大的正向贡献。

全球经济治理向何处去的困境，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G20 杭州峰会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包括“六个首次”：首次全面阐释我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要推进全球治理改革，一是需要建立“基于公平”的共商共建共享合作机制，处理好包容性、共享性、公平性发展问题，推进绿色、开放、普惠、包容、共享的跨境贸易、投资、金融、产业合作。二是需要制定“基于创新”的增长蓝图，解决好实体与虚拟、金融和创新、资源开发和非资源产业、人力和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平衡发展问题。三是需要建立“基于发展”的战略支点，统筹协调好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有增长有发展有共享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新时代面临新机遇

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应作出怎样的努力，全面提升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

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当前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特别要抓住以下重点：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大局；共同构建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巩固多边贸易体制，释放全球

经贸投资合作潜力；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合作；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以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目标，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按照上述工作重点，我国积极推动“和而不同”的包容发展，构建新型合作关系，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不断增强创造和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的能力。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对此，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国要带头推动同舟共济而非以邻为壑、相互协调而非孤立主义，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蔓延。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世界命运掌握在各国人民的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信息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6日 13版）

新时代呼唤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 改革和建设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 张永军

(2017年10月26日)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这一重大判断，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指明了方向。

新时代我国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国际社会希望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二。2016年，我国GDP增长6.7%，经济总量达到74.4万亿元，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进出口贸易额位居世界第一，达到世界贸易总额的11.5%。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对世界经济的走势影响较大，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较为明显。

新时代我国国际感召力明显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提议和方案反应积极。近年来，我国提出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共建“一带一路”等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

习近平主席2013年10月初在APEC有关会议上发出筹建“亚投行”倡议后，得到了一大批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回应。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数量增加到57个。2015年6月29日，《亚投行协定》正式签署，半年后协定生效，亚投行宣告

成立；2016年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开张；2017年6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二届理事会年会开幕当天，亚投行又宣布批准3个新意向成员加入，至此成员总数增至80个。如今，亚投行成员已遍布各大洲，同时兼顾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实现总体上的平衡。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2016年11月17日，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协商一致通过决议，欢迎共建“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344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区域经济合作。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取得丰硕成果。截至2017年9月，我国已同7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涵盖互联互通、产能、投资、经贸、金融、科技、社会、人文、民生、海洋等合作领域。

我国对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产生了重要推动力。例如，我国与其他四个金砖国家共同发起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对完善国际金融体系产生了明显作用。再如，在巴黎气候大会前，中国与美国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共识，为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召开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代表积极发挥协调作用，推动达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巴黎气候大会后，针对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国与欧盟国家通力合作，公开表达了对《巴黎协

定》的坚定支持，使其有望继续保持生命力。

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应顺应时代变化的要求和国际社会的呼声，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信息来源：《光明日报》 2017 年 10 月 26 日 13 版）

[成果目录]

《研究报告》2017 年第 45 期：补齐专业人才短板 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

《研究报告》2017 年第 46 期：因企施策，推进军工行业资产证券化

[国际交流]

10月24日，曾培炎理事长在中心会见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就加强联合国及经社文理事会与中心开展研究、交流等方面合作交换意见。

10月12日，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会见美国彭博传媒集团首席执行官史哲庭，探讨明年在北京举办“新经济论坛”相关事宜。

10月17日，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会见美国保尔森基金会新任总裁葛迪马，商讨双方未来合作事宜。

10月27日，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会见德国工商大会主席艾瑞克·史伟哲博士，就德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战略项目及加强中德两国中小企业合作等交换意见。

10月19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三菱商事中国总代表平井康光，商讨邀请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出席国经中心和中国社科院将于11月16日共同举办的“中共十九大：中国发展与世界意义”国际智库研讨会事宜。

10月31日，张大卫副理事长应邀出席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智库领袖午餐会”，同布鲁金斯学会现任会长斯特普·塔尔博特及即将上任的新会长约翰·艾伦及国内几家高端智库负责人，就中国智库发展、国际趋势与治理挑战等进行交流。

本期责编：胡敏一

通讯地址：北京市永定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050

联系电话：010-83362170 传真：010-83362176

网站：www.cciee.org.cn
